

魏晋痈疽和明代梅毒发生与流行的社会因素研究*

和中浚，任玉兰，谭红兵
(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成都 610075)

〔摘 要〕目的：探讨痈疽在中国魏晋时期、梅毒在明代中后期广泛流行的社会因素。方法：通过引用中医文献、史学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对比论证，从内史与外史结合的角度，探讨痈疽在魏晋时期、梅毒在明代中后期广泛流行的表现特点及其社会因素。结论：魏晋战乱造成的战伤感染，环境污染及服食丹石风气是痈疽发生与流行的主要社会文化因素；明代中后期梅毒的广泛流行与对外商贸开放、纵欲风气有关，而晚明时期社会淫欲世风才是梅毒大肆泛滥的根本因素。

〔关键词〕痈疽；梅毒；社会环境；文化因素

中图分类号：R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2723(2012)01—0001—04

疾病的发生与社会文化环境有着较大的关系，不同的历史时代往往发生和流行不同病症，这是不同的社会环境条件和文化因素造成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环境是疾病发生和流行的重要基础和根本原因。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中国古代较为典型的当数魏晋时期常见的外科痈疽疮疡和明代中期以后在中国广泛流行的梅毒了。本文拟通过引用中医文献、史学资料及相关研究成果对此进行论证，从内史与外史结合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在中医外科学上的表现和特点。

1 魏晋战乱及服食丹石与痈疽发病的关系

有学者对魏晋时期的社会特点作过精辟的总结，提出了它的 3 个主要特点：“魏晋南北朝是长期分裂的时代，是战乱频繁的时代，也是封建王朝不断更迭的时代”，^[1]“在这约 4 个世纪中，除西晋曾实现过短暂（约 37 年）统一外，全国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先后共建立过 35 个大大小小的政权。^[1]”，其中，董卓之乱、“八王之乱”、“永嘉之乱”、侯景之乱，十六国时期的前后赵、前秦末年等战乱等最为惨烈，造成“自元康以来……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自天地开辟，书籍所载，大乱之极，未有若兹者也。”^[2]战乱的直接后果就是无数州郡的饥饿和数以万计甚至数十万

人的杀戮和死亡，与之紧密伴随的则是疾病的发生和流行。

在这一时期的外科疾病中，最为多见的是痈疽疮疡，这种痈疽往往是因为战伤后普遍发生的金创所造成的，如学者认为《刘涓子鬼遗方》记载了很多战伤的救治情况^[3]，被誉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军事外科医学著作。同时，战争期间的饥饿、劳累、紧张、恐惧，必然导致机体衰弱，脏腑功能下降，气血紊乱，成为发生痈疽疮疡类疾病的重要内因。它也与战乱后尸横遍野，环境污染，恶劣的卫生条件，机体清洁状况极差等外在因素有关，诸种复杂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加剧了各种疾病特别是痈疽疮疡的发生。此外，这一时期社会二极分化，下层社会民众生活困苦，饥寒交迫，气血衰微；上层人士醉生梦死，膏粱厚味，醇酒炙搏，过食肥甘，服食丹药，内生火热，应当也是导致痈疽发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痈疽成为魏晋时期最为多见的外科病症，这从当时外科病症往往统称为痈疽可以窥见端倪，虽然这一认识源于《内经》，但当时仍以痈疽作为外科病症的代名词，如史籍中记载当时的外科文献《甘潜之疗痈疽金创要方》、《甘潜之疗痈疽毒惋杂病方》、《甘伯齐疗痈疽金创方》、《痈疽要方》^[4]，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课题（NO：09YJA870004）
收稿日期：2011—10—15 修回日期：2011—12—02
作者简介：和中浚（1946～），男，河北曲阳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医医史文献。

以及《痈疽论方》、《疗痛经》、《疗痈疽诸疮方》^[4]等多种外科专著皆以痈疽作为书名主题就足以证明其用意。笔者研究发现“早期外科专著记载的病证主要是痈疽,即皮肤疮疡类病症。其中南齐龚庆宣编《刘涓子鬼遗方》是现存有关痈疽病症及其方药的最早外科专著。”^[5]“专著中的病证以痈疽为主,反映当时痈疽疮疡是外科最为多发的病证,金疮等外伤是造成痈疽的重要原因。”^[5]宋以前成书的《刘涓子鬼遗方》、《卫济宝书》、《集验背疽方》、《外科精要》等早期外科专著中仍以痈疽病症为主的情况进一步支持了以上认识,尽管这种情况也可能与早期外科病症的认识水平,外科病症的分类名称和外科医家的个人见解等多种因素有关,但痈疽在魏晋时期的外科病症中最为多见应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此外,服用金丹石药的风气在魏晋时期形成高潮,成为痈疽发病的又一重要社会因素。魏晋时期服石成为一种社会时尚,上至达官贵人,下到平民百姓,特别是文人卿士,靡不趋之若鹜,成为古代服用丹石最为疯狂的时期。对于二者的关系,《甲乙经·卷十一·五气溢发消渴黄痺第六》传承《内经》的理论有“热中消中,不可服膏粱芳草石药。石药发疽(《素问》作瘡^[6])”的记载,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中“有黑色者,是石留黄毒。有赤色者,是丹砂毒。有青色者,是硃砂毒。有似盐颗者,是钟乳毒。”^[7]的丹石发毒造成痈疽不同颜色的记载,《刘涓子治神仙遗论》“辨发背”认为“有人多服金石烧炼之药”^[7]是发病的重要原因。稍晚的《诸病源候论·消渴候》等对消渴与服石、痈疽3者之间的病因病机关系进行了反复阐述“由少服五石诸丸散……石势独盛……其病变多发痈疽。”^[8]“渴利候”有“渴利者……由少时服乳石,石热盛时,房室过度……以其病变,多发痈疽,……热气留滞,故成痈疽脓。”^[5]隋代去魏晋不远,以上认识,不少应该源于魏晋时期,或者魏晋时期服石造成的流弊。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二·痈疽第二》中对二者的关系有切身体会,“余平生数病痈疽,得效者皆即记之。考其病源,多是药气所作,或有上世服石,遂令子孙多有此疾。”^[9]孙氏处于唐初,文中的上世很有可能指更早的魏晋时期,或指魏晋时期的影响。原因在丹石之药,性本温热,再经火煅,其性

必然更加燥烈,自然易致体内火热炎炽,外发痈疽疮毒。可见中医文献中对魏晋时期服石与痈疽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及其影响有着明确记载和认识。

2 梅毒流行与对外开放及明后期社会风气的关系

梅毒一病中国古代多称杨梅疮。最早记载于1513年的《岭南卫生方》抄本^[10],因其形似杨梅,所以中国古代多称杨梅疮。它在中国古代还有疳疮、横痃、梅疮、杨梅结毒、广东疮等多种名称^[11]。之所以叫做广东疮,是由于它是从广东向内地传入的原因。如李时珍《本草纲目》认为“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表,传及四方。……男女淫猥……发为毒疮,遂致互相传染,自南而北,遍及海宇,然皆淫邪之人病之。”^[12]作者强调此病古代方书未见记载,及其发病特点。

《中国防疫史》认为梅毒在我国出现的时间目前有二种认识,一是自古有之,二是明代从国外传入^[10],目前以后者观点占据多数。书中介绍了李敖先生详实的考证,列出了从1536年方广的《丹溪心法附录》到1632年陈司成《霉疮秘录》的一百年时间内12种医书中前所未有的集中记载杨梅疮的现象。颇具说服力^[10]。因此,虽然陈修园认为汉代《金匱要略》中的“浸淫疮”可能包含杨梅疮,王吉民认为《千金方》中的妒精疮是梅毒^[10],但都没有确证。这与二书记载的症状有可能与其他类似的疾病如麻风以及其他性病症易于混淆有关,另外它也与相关的其他可资佐证的材料不多,看不到当时有梅毒在社会流行的更多记载有关。但最近有学者通过对我国汉代和宋代居民骨骼的研究,突破性地发现梅毒已在我国“秦汉时期的居民中传播”^[13],这使汉代《金匱要略》和《千金方》中可能记载梅毒的认识得到有力的支持,也使明代梅毒外来传入说受到冲击。

仔细分析我国古代不同时期流行梅毒的二种说法,他们都与我国古代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从汉代开始,儒学在我国占据统治地位,达官贵人尽管可以娶三妻四妾,但外出冶游毕竟不是光彩的事,即使唐代受北方少数民族习俗的影响,风气开放,男女关系相对自由,特别是“中晚唐时期,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和歌妓的进一步增多,在士人中间,声色享乐、冶游狎妓之风盛行。”^[14]然而狎妓毕竟不是什么夸耀的事,因而文人诗中对自己冶游经历的回忆,都写得扑朔迷离,只能通过对

爱情的赞颂隐晦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如李商隐的多首爱情诗^[15]。在古代社会,嫖妓仍为多数正人君子所不齿,歌妓也多是卖艺不卖身。因而尽管证明当时已有梅毒存在和传播,但明代以前就整个社会大背景而言,参与这种行为的人员较为有限,感染梅毒和梅毒流行的范围应比较狭窄,在全社会影响不大,因而才没有引起医家和社会的充分重视,其结果就是梅毒(杨梅疮)在明以前的医学文献中罕见记载。

明代以后的社会风气与汉代和宋代相比就完全不同了,从外部条件而言,葡萄牙人利用中国明代中、后期对外开放商贸的机会,将梅毒传入中国。然而,更重要的是外来的梅毒与明代社会中后期淫秽腐化堕落的风气相呼应,得到了其滋生的社会土壤,这才导致梅毒在16世纪的中国大规模流行。除前述杨梅疮在明代后期医书有集中记载之外,更有标志性意义的是当时产生了陈司成的《霉疮秘录》(更有早于此书的韩懋《杨梅疮论治方》,惜已佚),它是我国现存第一部论述梅毒的专著(1632),书中对其往往因嫖妓而得,起于广东、其名称症状及古籍未载等都有详实的记载:“往余弱冠时,与友人某某者同试虎林。彼狎邪青楼,……北归未几,友卧病,心知有所中也……因察气运天时,病源传染,嗜好爰及,或问治验方法,类成一帙,名曰《霉疮秘录》。^[16](崇祯五年叙)”又在《总说》说“细考经书,古未言及。究其根源,始于午会之末,起自岭南之地,致使蔓延通国,流祸甚广。”在《霉疮或问》说:“此症有谓杨梅疮,有谓棉花疮,有谓砂仁疮,名状不一者,何也?曰:毒之相感者,一气也;脏之见证者,各异也。……如霉疮,有赤游紫癍,如疯、如疹、如砂仁、如棉花、如鼓钉、如烂柿、如杨梅,或结毒破烂孔窍,名状不一,大约似杨梅者多半,故曰梅疮。痘疮、梅疮皆以形名,所以不一也。”^[16]任何疾病一旦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危害大众,不可能不在医学文献中有所反映,明代以前和明代中后期梅毒记载的资料反差如此之大,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疾病流行的范围和造成的影响大小截然不同。

明代梅毒不仅作为一种传染病在医学文献中屡次记载,而且在文人的文学作品和笔记中也有充分反映。很多谈及梅毒的资料都要引用汤显祖在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为他的好友,当时处在病

中的屠隆写的一组十首七绝,诗题名为《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诗名中的“情寄之疡”,即指屠隆寄情声色,身患“梅毒”而言。屠隆是明代一位私生活不太检点,性交往肆意妄行的风流人物。从汤显祖写给他的“长卿曾误宋东邻”,以及“岂有妖姬解春姿,岂有狡童解咏诗”的诗句来看,不难想像他在性行为方面的放纵,这与明朝中后期的社会风气有关。明代中后期,“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17],据反映明末社会风气的明谢肇淛《五杂俎》记载:“今之娼妓布满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它穷州僻邑,在在有之,终日倚门献笑,卖淫为活,……两京教坊,官收其税,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谓之土妓,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18]这种好淫纵欲的风气远超此前的任何时期,连唐代也望尘莫及。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当时这种风气的缘由进行了非常精辟的剖析:“而在当时,实亦时尚。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至大位。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第之事也。”^[19]可见,晚明的颓风就是因于嘉靖时期的这种上行下效的风气,至万历时期以后更甚,例证也更多,如名相张居正去世与此有关。

近年吴氏在论述晚明风气时提及:“万历年间进士陈泰交还曾撰写过一篇被认为是过于‘放诞风流’的《优童志》,并坦然地把它收入自己的文集中(注: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180,集部别集类存目,第1628页,中华书局,1965)。中国古代士人向来十分注重自己文集的严肃性,喜欢维护一种道貌岸然的形象,尽管平日也会有许多游戏之作,但都不收进文集。陈泰交此举亦时风浸染所至,在别的时期几乎是不可想像的。”^[20]更是一项非常典型的案例,强有力地证明了晚明尚淫的世

气。更为系统的论述是在吴氏所著《明清社会性爱风气》第三章“晚明的纵欲主义思潮”中^[21]，他用“从“心”到“身”的全面解放——晚明纵欲风气的思想源流”和“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争——晚明社会的纵欲风气”长达二节文字，剖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思想和社会原因，可见学术界对明代中晚期的这种社会风气的认识已非常透彻，且已形成共识，这应当是梅毒在明代大肆泛滥的根本原因。

此外，其他疾病的发生，如明代以后铅中毒、煤气中毒等职业病增多，很明显与矿业生产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朱大渭. 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1.

[2] 唐·房玄龄. 晋书·卷八十二 [M]. 中华书局. 1974: 2144.

[3] 周一谋. 一部现存最早的外科专著——略论《刘涓子鬼遗方》[J]. 湖南中医学院学报, 1987, (1): 46.

[4] 唐·魏征. 隋书·卷三十四 [M]. 中华书局. 1973: 1042, 1044, 1045, 1046.

[5] 和中浚, 王缙. 早期外科专著关于痈疽的学术成就及价值 [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1, (1): 25.

[6] 山东中医学院. 针灸甲乙经校释 (第 2 版)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 1039.

[7] 丁光迪. 诸病源候论校注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1: 155, 161.

[8] 胡晓峰. 中医外科伤科名著集成 [M]. 北京: 华夏

出版社, 1997: 8, 26.

[9] 唐·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江户医学影北宋本. 1955: 393.

[10] 邓铁涛. 中国防疫史 [M]. 南宁: 广西科技出版社, 2006: 183, 182.

[11] 唐汉钧. 中医外科临床研究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9: 299.

[12] 明·李时珍撰. 尚志钧, 任何校注. 本草纲目·第十八卷. 合肥: 安徽科技出版社, 2001: 776.

[13] 张振标. 中国古代人类麻风病和梅毒病的骨骼例证 [J]. 人类学学报, 1994, (4): 294-299.

[14] 刘艳萍. 中晚唐冶游狎妓之风与艳诗创作 [J]. 聊城大学学报, 2009, (1): 107.

[15] 巫山高. 唐代的妓院文化与李商隐的冶游诗. <http://blog.sina.com.cn/wushangao986>.

[16] 明·陈司成著, 高丹枫注释. 霉疮秘录.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94: 1, 5, 10.

[17] 明·凌蒙初著, 陈伟点校. 初刻拍案惊奇.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 1.

[18] 北京市文史资料委员会. 中国文人非正常死亡之谜 (插图增补版) [M].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5: 251-252.

[19]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 [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5: 153.

[20] 吴存存. 明中晚期社会男风流行状况叙略. 中国文化 [J]. 2001, (5): 107.

[21] 吴存存. 明清社会性爱风气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

(编辑: 迟 越)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Factors on the Prevalence of Carbuncle – abscess in the Wei & Jin Dynasties and Syphilis in the Ming Dynasty

HE Zhong – jun, REN Yu – lan, TAN Hong – bing

(Chengd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engdu, China, 610075)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environment, cultural factors on the prevalence of carbuncle – abscess in the Wei & Jin Dynasties and syphilis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Ming Dynasty in China. Metho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literatures, historical data, and related research findings have been retrieved and compared with each other. In the article, we are to explore the epidemic features and the influenced social factors of carbuncle – abscess in the Wei & Jin Dynasties and of syphilis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Ming Dynasty with referring to official and unofficial history records. Conclusion: It is believed that infection in war wound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the popular Taoist magical pellets taking accounted for the prevalence of carbuncle – abscess in the Wei & Jin Dynasties. And that open foreign trade and sexual indulgence resulted in widely prevalence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Ming Dynasty. Furthermore, lust social environment was the root cause of pandemic syphilis.

[KEY WORDS] carbuncle – abscess; syphilis; social environment; cultural factors